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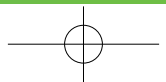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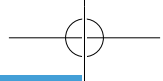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2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学术简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智库功能三项工作为一体的建制单位。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与物质要素，充分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及人类其它各种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它的目标是构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为世界整体与本国人民服务。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坚持基础研究的思想导向，以学术为主导，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为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包括：1) 学术研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志在专门、深入、有创造意义的学术成果，向社会贡献学术思想；2) 人才培养，探索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以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需要，培养新型人才，使其既具备思考能力，也胜任实际工作；3) 智库功能，在研究与教学的支撑体系保障下就重大问题提供建言，为应对各种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献言献策；4)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延展学术网络与思想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努力与国内与国外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取其所长，学其所能，并诚请同行的帮助与支持。



## 研究院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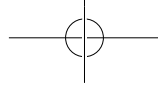
### “博雅工作坊”第一工作间 区域研究的经验、理论与方法 2018年4月12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学术研讨会第一工作坊围绕着区域研究的经验、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上半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高丙中主持，下半场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主持。

上半场首先发言的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汪晖。汪晖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区域研究，跨区域研究，以及谁的区域/跨区域研究”。他在发言中就区域研究的基础、跨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和重新界定区域研究的范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汪老师认为，当前区域研究突然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门类，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一带一路”为区域研究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动力，各个机构、国家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国际组织都要求这方面的人才。但是，尽管有很多院系的学者在做我们通常被说成是区域研究领域的工作，区域研究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似乎并不是那么清晰的。在他看来，区域研究的最基本的基础应该是从基础研究开始，而不只是做智库研究。如果没有语言、历史、文学、文化、宗教这些日常生活实际的基础研究，区域研究的基础是打不牢的。智库研究固然也很重要，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更应该被强调。

汪老师强调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要提供理解，它不仅要提供外部的人进入和里边的人行动的理解，而且要在交互关系中理解它的内部视角提供意义。所谓的区域研究，主要是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形成的，区别于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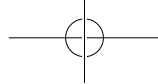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洲的东方学的类型，美国的区域研究实际上是它总体战略研究的一部分，服务于整个战略目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区域研究学者都完全是跟国家连体的，但区域研究和总体战略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始终存在的。仅仅从搜集材料、资料的角度去理解区域研究，而忽略背后整个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略是不能理解战后区域研究建立的基本条件的。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区域研究也多半是在帝国扩张的时候达到高潮的，英国、美国、日本都是如此，当帝国开始萎缩的时候，区域研究也相对萎缩。汪老师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区域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形式是和霸权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西方世界已经对这个领域进行了反思，他强调当我们开始进行中国的区域研究设计时，需要对这些反思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不要重蹈覆辙。他还以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研究中政治军事和文化不同取向进行了比较，认为区域研究即使在战略研究的层次上提供历史理解也是有区别的，只有立足于基础研究的区域研究才能提供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点汪老师强调了区域研究中跨区域视角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大量的区域研究实际上是以国别为中心扩散到其他区域的，并不是真正的跨境研究。而在一些地区研究中一开始就要设定跨区域的视角。这种跨区域视角有一个方法论上的难题要解决，就是由于区域研究在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它不生产理论也不生产真正的话语，只是套用别人的话语、理论和框架，这是很难满足跨区域研究的。改变现状的第一步就是不要把区域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割裂开来。过去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的经验，人文、社会科学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历史的霸权，就是把西方的框架用于其他地区，把其他地区对象化。但今天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的打开，区域研究能够肩负起重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使命。区域研究不再是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一般范式去套在某个地区，而是从区域研究中打开新视

野，获取新知识，从而去根本性地改变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汪老师认为区域研究将会在二十一世纪对整个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

汪老师还强调了要打破区域研究学者的把时间空间化和把空间彻底时间化的倾向。他认为，把时间空间化，就是把变动的历史只认为一个特殊的空间，比如说那个是西藏，那个是伊朗，或者是非洲的某个部落，它就是那个空间，而忽略这些空间本身是有自身的时间性的，并且它是敞开的不断变化的经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要研究的内容都在它这里边。如果你总是把这个变化的时间空间化，就有点容易犯我们通常说的“东方主义”的错误，我们总是想象那个跟我们如何如何的不同，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它的特殊性。从理念上来讲，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时空，有它跟其他时空的交往关系，考虑到在这个差异中的时间（历史变化）是重要的。把空间彻底地时间化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时间化是指每一个事物之间有多重的时间，是相互联系的但不均衡的时间；另一种是把这个时间看成一个典型的、完全进步观的时间，所有都按照我们设定的目的来看。汪老师指出美国地区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地区研究的学者不了解当地文化，根据数据写论文的现象，这是一种把空间彻底地时间化的表现，将会给区域研究会带来更大的危机。

最后，汪晖老师提醒大家要思考区域研究的范围问题。他认为，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重心都是向西看的，现在将重新进入亚非拉，这需要我们对我们的态度有一个认真的思考。他提出一个方法论上的解决问题就是来重新界定区域研究的范围。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区域研究我们应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包括不包括那些中心地区？它们是一般社会科学的内容还是区域研究的内容？第二，我们自己在区域里面？还是在外边？他强调“他者化”应该辩证地看待，从哲学上理解“他者化”有



时候反过来是你看待自己的过程。中国的区域研究也应该是个中国能够重新认识自身的机会，突破从西方镜像中获取的对自己的片面认知，汪老师认为中国应该在推进区域研究时，对自己的认识和形象有一个知识上的修正。

第二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他的主题是“作为文明研究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他主要从文明研究和知识范式的角度对于区域研究对中国的意义和区域研究的世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渠老师首先对北大的区域国别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区域研究如果由北大来做，就不应该再只是对于某一个学科分支、某一个带有国际关系或者是仅仅从国别角度来理解的地方性的或者是国家性的文化、语言、政治以及政治之间的关联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北大来做，特别是在中国，就是在古今的关系里和在当下的世界的处境里去理解区域研究是什么。北大的区域研究应该为区域研究或者是中国自身文明关照下的区域研究提供基本的范式，去构建起一套我们应该构建起的知识体系。另外一点，他强调区域研究也应该加深对我们自身文明的理解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区域研究其实承载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北大如果要凸显区域研究的这样一个学术志向的话，就是要以知识贡献作为一个最核心的努力，而不是其他已经有很多的表面化的区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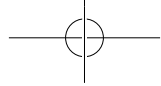
渠老师认为区域研究在中国的整个现代(100年以来)的知识体系构造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枢纽性的工作。他认为西方近代的《民族志》、《古物学》、《进化论》等这些基于殖民地和帝国而产生的知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中国现代学问的起点和基础。他认为，如果没有当初像王国维先生受到了西方的语文学、古物学的启发，

我们整个的考古或者是古物和古文字的系统到今天为止都是很难搭建在一起的，但这个恰恰是西方在自己的19世纪的近代知识转型里面产生的一种新的范式，恰恰是由西方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带来的。陈寅恪先生的努力也正是从西方学习多种的区域性语言和文化的理论去重新理解非常复杂的中国的构造。他强调从这点出发就能充分体现区域研究绝对不是只限于某个区域的研究，它和知识体系、我们的新观点、新范式以及我们对自身文明的理解以及世界文明走入世界历史时彼此之间的关系都重新构成了一些反思、理解和重新认识的过程。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渠老师认为区域研究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区域研究需要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他认为像亨廷顿这样的著作才是最根本的区域研究的著作。在他看来，区域研究必须要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延伸，纵向的牵涉到这个区域文明的构造和它历史上每一次变迁的轨迹，横向的包括它和它周边相互互动、相互生成关联以及它跨区域进行的传播。就像当初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和欧洲，欧洲所谓的对于自身希腊文明的重新复苏，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阿拉伯世界的储存和转译而重新输回欧洲的。

渠老师认为区域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研究方法，而应该建立在整个我们理解自己和理解西方的最关键的议题上面。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研究不该是一种只从现代狭窄的民族国家出发的一种研究。比如，一个受到英国和英国文明训练的葡萄牙作家，再用葡萄牙语来写作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限于我们用葡萄牙语和葡萄牙这个国家的概念来限定它，因为他关心的是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文明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和现实困难所在。区域研究勾连着任何一个区域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也勾连着它自己的传统和现代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范围里不断产生的反应，刺激性的、主动性的反应或者是自己的重构再造的这些过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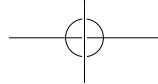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以眭涛老师研究的土耳其为例分析了这一点。他认为，我们今天把土耳其当成一个跨亚欧大陆的民族国家来处理，特别是经过凯末尔的现代改革以后，我们已经把土耳其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来看待了。但是，直到今天，土耳其知识分子、企业家、精英，哪怕是一些民众，他们所想象的土耳其仍然是建立在奥斯曼帝国或者是之前突厥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在土耳其的内核里，它不仅是一个帝国想象的共同体，而对于未来的想象仍然还是要以突厥文明作为核心来构建的。在他看来，我们就不能只研究土耳其今天那小小的问题，比如阿尔多安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之类的问题，我们越用这种方式研究，越不懂土耳其是什么，因为这些现实的问题都与奥斯曼帝国曾在这一地区构建的复杂综合体仍然在语言、亚欧关系与近东三大宗教关系方面的复杂影响有关。要理解这个现象，就必须理解区域研究和整个世界在各个层面的关联。

最后，他强调了任何的区域研究都是中国反观自身的一个通道和一面镜子。他认为区域研究所呈现的问题，不仅是所研究区域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我们理解了今天土耳其的问题，我们才会理解今天新疆的民族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虽然土耳其与我们不接壤，但是我们的问题却时时刻刻指向他们对他们的国族或者帝国的想象。只有我们理解了东南亚小乘佛教的体系，我们才能理解我们整个的西南区域的少数民族和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在宗教、文化上不断拉锯的过程，我们才能回答费孝通先生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些不同宗教、民族、族群如何在中国构建一个完整的政治共同体和它自身的认同。所以，渠老师认为，无论我们所研究的区域与我们接壤还是不接壤，它都构成了我们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也构成了中国文明理解自己在一个个非常长的脉络里不断自我反思和构建的最重要的部分。中国的古代即是如此，在古人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们回到自身不断检讨、认识，不断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从

这一点上讲，区域研究对我们自身的哲学、历史、文学研究和理解自身文明是密切相关的，理解中国传统如此，理解中国现当代更是如此。渠老师认为我们处理自身矛盾问题的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甚至必须依重于这种意义上的区域研究。

渠老师还提出了从区域研究来突破中国自现代以来只在中西格局里理解世界的路径。他认为从知识范式来讲，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是以中西问题的参照来看待世界和看待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在一个以西方为主体构建的世界历史的空间里面来成长和适应的，我们看待西方、看待世界和看待我们自身的方式仍然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来不断完成的。他不认为我们真正了解西方，他认为我们了解的大致是以西欧作为母体的西方，而不了解一层一层世界延展出来的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关联。如果区域研究能够以上述方式呈现出来，那么它对于我们理解世界、理解不同的问题，哪怕理解我们自身都是至关重要的。渠老师认为区域研究不仅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是未来很重要的基础。如果北大的区域研究只做成一种智库，只做成一种国际关系，只做成外语的一个语种，只做成一个众多的世界的花朵里的一朵来理解，他觉得就不会成功。他指出，把区域研究做成是一个可以把所有这些问题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学科，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第三位发言的是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缅甸研究院院长李晨阳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区域国别现状研究的思维和视角”。他从现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现在研究中五种错误的“中国式思维”和应该培养的五种视角，以及应该如何深化我们国家的区域国别现状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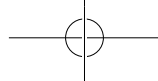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拥有丰富区域国别现状研究经验的李晨阳老师针砭时弊，对现在中国区域国别现状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和思考。一般而言，区域国别研究是综合性的研究，是指某个地区或者国别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外交、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但是，李晨阳老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越来越集中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外交等现状问题，强调的是智库研究，而研究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少。他认为这种把区域研究界定于智库研究确实是有许多问题。他谈到现在做地区国别研究，尤其是现代问题的研究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在他看来难度还是比较高的。他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近几年中国关于区域国别现状问题的研究成果数量的井喷并没有带来水平的同步提升。比方说对其他国家的政局和对华政策这些最受关注的问题，国际问题学界基本上的研判都是失误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又找不到原因，他认为中国一些学者的解释普遍缺乏说服力。

李晨阳老师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基本原因还是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综合研究，总体上缺乏一个理论体系、方法以及系统的思维和视角。研究区域国别的政治可能就借用政治学理论，研究它的外交就用外交学理论，研究它的民族和宗教就借用民族宗教学理论，没有一个总体的方法和理论，也没有一个独特性。即便是这样，很多人还没有这种理论修养，所以很多区域国别研究往往是想当然。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就像盲人摸象一样，现在往往有些学者认为自己这次去这个国家见了几个学者就把他们说的话引用为是一种经典，拿这个来做例证，这是太简单化了。

对于现在学术界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很多不规范的问题和不好的倾向，李老师也进行了总结。首先是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专门做热门国家和热门话题，没有固定的研究

点，不打学术基础，不先做学术研究，热衷于做政策研究，学者在研究领域上不合适地跨界，等等。其次，研究者的学术训练不规范，区域研究对于研究者的要求很高，既要懂得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还要对所研究的问题的某个学科理论和方法有很好的掌握，还要有写作和研究能力、分析能力，能同时做到这些的少之又少。再次，他认为咱们区域国别研究在学术层面与国际学术平台不接轨，现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发表的英文文章或者是用对象国语言发的文章很少。还有一个点是很多研究者点和面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具体做某一个国家研究的学者，很难对周边其他国家的情况有很多了解，这样是很受局限的。因为很多东西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东西，和邻国、和世界、和地区都是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低水平重复的问题。最后，尽管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内区域国别研究做得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大家都是做热门的，很多基础的研究问题没有人做；宏观研究多，细节深入不下去。反观日本在缅甸进行的国别研究，它能深入到做一个省邦的税收的增收体系和成效，他认为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尽管存在着上述诸多问题，李老师也认为现在不要妄自菲薄，需要做的是构建一个自己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体系。

李老师认为现在困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有几种中国式思维。第一种，我们喜欢用自己的所谓理性和思考习惯去研判其他国家。李老师强调做区域国别研究要用对象国的思维去观察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他以缅甸2015大选为例解释了中国和对象国思维的不同。大选之前我们国内外交、安全等部门机关都认为执政党能够继续执政，判断的理由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在大选的时候一定会舞弊、搞鬼以维系自己的政权。但是从缅甸二三十年代有议会选举以来，人家历史上从来不搞这种事情。输了就是输了，输了我可以不认账，但是没有搞舞弊的现象和习惯。再有就是我们经常认为，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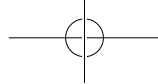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展就是硬道理。但是，很多国家并不这么认为，发展问题他们当然关心，但是在他们看来他们现在发展不起来不怪政府或者政策，这可能跟他们的宗教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致富先修路的观念，在别的国家往往并不是这么想的。第二种，我们喜欢将对部分国家的经验硬套到其他国家，在学术界存在，更严重的是外交界。外交官都是流动的，很多从欧美、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使馆调到东南亚国家使馆的官员就喜欢用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套这些国家，这往往容易出问题。第三种，我们经常混淆华人的血缘、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李老师说这个问题在现在一直没有搞清楚。以缅甸的果敢问题为例，果敢族虽然都是汉人，但果敢在缅甸是一个合法的民族，果敢同盟军被缅甸政府军打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很多人认为是嫁出去的姑娘在婆家受委屈，我们作为娘家应该出手，李老师说这种观念是不对的。第四种，有些人故意制造原本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故意拔高某些问题的严重性，以获得批示。在李老师说看来，这个问题是更加严重的，他认为在我们实际工作部门这种问题是存在。在缅甸现在就有人讲美国的军舰、美国的飞机马上就要进驻缅甸了，在缅北有多少雇佣军，实话讲这些问题都是捏造出来的，但是利用这个机会就可以去忽悠领导，达到某种目的。第五种，我们一方面反“中国威胁论”，另外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有一种“中国中心论”和“中外友好论”。李老师说我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在讲现状问题的时候只讲对方怎么怎么样，没有想过我自己怎么样。他强调在我们的现状研究中是一定要去除这五种中国式思维。

在此基础上，李晨阳老师提出要培养区域国别研究的五种思维。第一个是历史的视角，他认为其实很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答案。他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互信为例，提示研究者应该注意日本、美国在这里投入的存量，中国历史上在这一地区输出革命等等历史维度的背景。第二个是文化的视角，李老师说我们认为现

在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他以铁路建设为例，探讨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中，因为友好关系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在谈判的时候不断提高价码而使中国倍感受骗的事件，提示我们要真正去了解对象国的文化。第三个是全球的视角和区域的视角，比如说缅甸的政治转型肯定和美国有关系，也和东南亚整个区域的政治转型有关系。第四个是比较的视角，一定要和邻国比较。李老师说谈到虽然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都信小乘佛教，但是四个国家的小乘佛教差距很大，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的视角，都把他们的当成是同样的小乘佛教就很容易出问题。第五个是中国政治的视角，李老师说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时首先要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的政策。

最后，李晨阳老师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对深化区域国别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第一个是要有宽广的知识积累，既要有区域国别历史的积累，还要有全球史、文明史这些积累。再有就是扎实的语言基础，既要掌握大语种英语，还要有非通用语的语言的掌握。第二是扎实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在研究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政治、历史、经济、国际外交、社会、民族的问题，就应该有某一个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而不能仅限于就事论事的描述。第三个是深入持续的田野调查，一定要常年坚持。因为任何国家都是发展变化的，中国40年代发展变化这么大，如果拿20年前对中国的认知分析今天中国的情况肯定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别的国家也一样。第四个是建立一个重大问题的分析框架，李老师说以自己的缅甸研究为例，缅甸政治经济里面的重大问题应该总结出几条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就相当于一定的定理，然后拿它去验证某一些信息。最后，李老师说应该构建一个强大的学术人脉。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也是一样，在中国国内，在对象国、在欧美学术界应该有一些人脉关系，没有这样的东西，做出来的东西无论是政策性，还是学术性都是不够的。



第四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副教授牛可，他发言的题目是“学科体制、通识教育和区域研究”。他主要结合自己做北大区域国别研究规划报告和研究美国地区研究创立时期具体历史的经验对于学科体制和通识教育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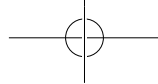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牛可老师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教育部主要是作为一个智库运动导向的推动之下蓬勃发展起来的，我们很多的认识、学科认识论的讨论和知识社会学面向的讨论都还没有跟上。他曾经研究过美国 1943 年到 1953 年时期的规划、议和讨论，他深刻的感受到我们比 70 年前美国所做的差得很远。

牛可老师首先跟大家探讨了美国地区研究独特优势。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而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在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当中一向是存在的，只不过以往存在的方式是面孔模糊的或者是边缘的、微弱的。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之下，对自己的社群或者民族国家以外的知识，建立学术传统，建立知识生产体系的这个历史是源远流长的，西方有语言学、东方学的发达的体系。而美国建立的地区研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突破于狭隘的对地区的认知，把很多 crossing borders 的研究纳入进来，这是一种新的取向。美国的地区研究以及演变到今天的区域国际研究是有股独特的强大力量支撑的，就是它在现代学术体制与学科科技体系为主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当中给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和重组。美国人在创建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当中非常有意识地要和传统的东方学拉开距离，甚至要跟现代语言学拉开距离，他们是在做要建立一个普遍社会科学的途径和全世界覆盖的社会知识的重大的努力。今天包括有强大东方学传统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等都越来越多采用美国的模式，引入美国式的地区研究概念、组织方式和理念等，美国式的地区研究还是有独特的优势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

产生了很多它不断在纠正自己、校正自己，在改变自己的思想成果，因此牛可老师特别同意汪晖老师说的要对他们的反思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

牛可老师认为在现代的大学体系中，区域国别研究有三个基本的功能。第一个，它扩充对外研究。美国人认为在既有的学科体系当中的对外研究太少了，那些已经建立起来的旧的东方学系远远不够，而且东方学研究的东西很大程度上不是社会科学的东西。他的社会科学是西方中心论的，幅度不够，牛可老师认为今天我们反思的很多东西其实“二战”之前美国人就有了。美国当时的设想并没有都取得成功，比如美国人当时想把西欧和美国都作为一个区域纳入到区域研究框架，这个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在现有的大学体系之下扩充对外部知识研究的体系做到了。1945 年以前，美国人对西欧都只有很少的一点研究，但到今天，美国大学中越好的历史系对外国史的研究往往能占到 70% 以上。第二个功能是推进了美国跨学科的发展。美国在现代学科体系协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所谓的“学科孤立主义”的情况，一些社会科学家的领袖人物认为一些共同的、基本的、重要的、深刻的问题不能在旧的学科体系当中得到有效的处理。因此，跨学科从 20 年代以后就成了一个口号，一个标志。美国的学科体系比欧洲的还要强，所以它的反弹也更大。而这个跨学科的努力主要是通过地区研究来实现的，牛可老师认为，地区研究是美国科学史上规模最大、最系统、最深刻的一次推进跨学科的努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区域研究，美国的科学今天不会是这样的规模。第三个功能是在各个层面上以各种方式增进美国人的国际理解的能力和国际审美能力。比如说，藏传佛教在西方成为一种时髦，这个就是和地区研究培养起来的大学校园里的那种审美品位的偏好很有关系的。像汉斯·摩根索这种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完全是主张权力政治的人，在地区研究创建之初就一眼看到，对外国的研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审美偏好，进而成为从根本上





改变美国人的他我之辩的思想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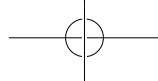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牛可老师认为虽然我们和美国的差别很大，有些地方其实比起当时的美国我们有更大的优势，比如就北京大学而言，我们今天关于外国语言的优势，就是当时美国人在1945年到1950年这个时期所没有的。但是另外一些方面，就我们的这种规划、研讨、学科认识论上的讨论，还是远远不足。当初美国地区研究创始阶段的基础文件的质量今天在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中还是很不容易看到的。

牛老师在后半部分着重强调了通识教育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今天很重视在本科生中开展通识教育，但我们的大学领袖，我们参与到区域国别研究的运动当中的人，特别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们得有清晰的自我认识，他们要对自己进行通识教育。牛老师谈到，通过访谈，他发现，各个学科的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解，往往是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出发。比如，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是把区域国别研究置于国际研究这个概念之下的，而不能理解区域国别研究根本上是超学科的、跨学科的，是一个包容各个学科的上层构造这样一个最合理的趋势。现在也有在学科内部建立区域国别研究的想法和尝试，仅从学科架构、学科体系来讲，这个不太合理，因为地区研究不是一个学科，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如果在进行通识教育的很多老师自己受的是专业教育，而且看起来长期以来并没有建立超越专业知识以外的视野和认识论，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进行特别好的通识教育的。没有通识教育意识的学者也可能对区域国别研究做出很多的贡献，但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通识教育，如果不在学科认识论，如果没有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这一类的知识，对知识没有一个体系性的反思，我们下面的通识教育的问题很大。

牛老师最后批判了让区域国别研究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相对封闭领地的趋向。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首先的一个向度就是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要在地区知识和某一专业领域都立得住足，站得住脚。我们要出一批人既是学科领域里面有权威性，又在地区领域里面有强有力的存在，这样的人才能够让我们未来的地区研究能够走下去，能够有长远的发展。地区研究和学科研究有很多矛盾，学科有挤压、排挤地区研究而偏重本国研究的这样一种趋势。现在社会学、政治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地区研究的要素，但是真正在题旨上、在自我定位上明确的很少，传统学科对地区研究要压抑，但是地区研究想在这个过程中甩掉学科，想奔回五六十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那种没有学科归属的，像社科院的国际片，像北大曾经有过的亚非所的那种模式，大概在学术的资质和权威性上是会出现问题。

#### 【主持人点评】

高丙中：谢谢牛老师，因为他对北大的老师做了访谈，自己又是以美国为例做了相关研究，所以他有很多想法，信息也很丰富。核心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搞区域国别研究没有达不到美国早期的那个水平，各个方面确实实都有问题。但是汪晖跟渠敬东老师前面都说，如把区域国别研究能够不是作为边缘的东西来看，再加上重构社会科学的雄心应该还是有希望的。现在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院，有充足的资金，大家在一起有所涉猎，慢慢形成话题，形成团队，然后形成交流的群体，学术才能往前走。三位老师在这儿，还有几分钟，谁愿意提一下问题，跟老师们做一下互动。



### 【老师点评】

王跃生：我谈一点感想。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小组很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是必须走在前面的。无论在北大，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区域与国别研究都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但是，像牛老师说的，它确实是遇到了一些区域研究上的障碍，比如搞区域经济研究，首先要对经济学很清楚，你对对象区域很清楚，把这两个事都搞得很清楚的人就已经很少了，就已经凤毛麟角了，他再有热情、有意愿，愿意投入到这个研究里面去就更少了。所以我们要么是培养的是那些对什么问题都能聊一点，要么就是像我一样在现在这个专业里面去做我的经济学研究，我的研究是不关注其他国家的差异，在我的眼中任何一个区域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 case，我有一个 idea，有一个理念，弄一帮美国的数据，弄一帮中国的数据，弄一堆哪儿的数据，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完全是把学科作为主导型，绝对统治力的研究，这个研究跟我们理解的区域研究还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要做好区域和国别研究的话，无论是区域研究、政治研究、人文学研究、历史研究，可能都要首先把理论和方法论这些基础的事搞清楚、搞明白，这样能保证我们一开始走向大致正确的道路，否则就有可能陷入过去已经一再走过的那样一些错误的道路，我就这么几点体会，感觉他们讲得非常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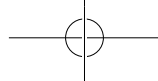
牛可：美国有一个特别好的组织社会学研究还没有发表，这个研究考察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群体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文章认为培训一个成熟的学科专家，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所需要的时间只是培养一个具有足够资质的区域专家的时间的 1/3。所以对学生而言，如果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地区专家，他得多花三倍的时间，所以对他们而言，合理的路径都是去搞学科的研究。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比其他各种各样的类型的学术都更需要外部投入和顶层支持的。比如，如果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生

要一样的学制，怎么要求他中国史做到世界史那样的学术深度？而美国一定是这样的，所有涉外的专业都要更长。我们这次规划里也写了，学校应该对此有特别确定的实实在在的支持。

### 【观众提问】

某学生：我提一个问题给渠老师。我个人是做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我对这个问题是很困惑的。就是，当你做一个海外研究的时候，什么是中国文明？对于我们研究的区域的历史应该如何进入到我们对他们现实生活的表述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把握的问题。

渠敬东：时间有限，我只能简单说。第一个，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对区域和国别研究整体的比较顶层设计的讨论，就是他想要用力的方向，而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整体领域的努力方向去要求每一个研究，这个是我想说明的。因为每一个研究都是专业的，而且它一定会用非常专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一个学校要设一个框架式的努力的话，考虑的角度不应该只是通过一个专业的感受来体会。但是您说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我是觉得也许您举的例子，他把文明说得太大了，因为文明的实质就在于你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生活的联系去感悟，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概念。所以我想说的恰恰是，刚才牛老师说的多学科的、跨学科的努力，我觉得这不只是在学术研究里面的含义，而是它在任何一个田野里面都是一个整体的方面。就是说，你关注的问题都是一个整体的照面，所以我恰恰说你的感受我倒是挺同情的，就是你一定是带着一种自我的理解的方式和对他理解的方式相互碰撞而产生的非常复杂的经验，这个我认为恰恰是一种我理解的文明性、文明间的关系，而不是我们把文明说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有可能用的概念的理解不同。



高丙中：这个还是挺清楚的，你做一个学科要有这个关怀跟我们在一个具体的社区里面去做这还是两回事。我分享一下，在专门的社区民族志里面，你写一个文明被整体呈现或者你感觉到了，你理解了把它呈现出来。文明包含很多内容，不是说所有的文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社区里面都能呈现出来，那就不是一个社区的现实生活，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民族志描述了。

问题：我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我想问李晨阳老师一个问题。我现在困惑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其他研究怎么划界的问题，比如说国际关系？

李晨阳：这个划界本来就有困难。刚才牛老师也提到，现在关于区域国别的学科归属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扩大区域国别的学科的属性，北大的做法是在外国语言文学下边设立一个区域国别研究，云大现在的做法是在政治学科下面设一个区域国别研究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其实这个东西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比方说设了之后，历史怎么办？社会学、民族学怎么办？是不是就不包括进去了？我知道原来在外语学院好多研究印尼宗教、印尼文化的，在博士论文的时候通不过，学位评定的时候就有问题，认为跟外国语言文学没有关系，没有这个学科属性。在政治学下面设，本身政治学下面就有国际关系的二级学科博士点，我们怎么切割和区分？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过去没有二级学科博士点的时候，我带的缅甸的学生肯定是属于国际关系的，现在有了，可能相对会比较窄一点。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特别严格地去区分，一定要把它切割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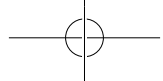
在下半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高丙中教授带来了题为“世界社会的民族志分布点与区域研究的探索”的发言。高老师在演讲中首先简单介绍了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回顾了北京大学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成果，并对“世界社会”

概念进行了阐发，最后提到落实好人类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环节——基础的民族志点研究和高层次的对整体文明的关怀——对于发展好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

高老师介绍：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在将近 15 年中做了大约 30 个境外民族志的点，现阶段的任务是将散点研究整合为系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在 2002 年的时候，龚浩群为打破国内既有人类学人才培养的僵化模式，形成规范的人类学的民族志，到泰国开始了海外民族志人才培养项目，多年下来北大有 30 个海外民族志研究点。高老师认为整个创业过程是艰辛的，但是却是做人类学的本分工作。

高老师介绍道，“人类学”这个学科名称中包含的“人类”两个字体现出学科前辈非凡的自信，似乎这两个字涉及的领域太过宽泛了，因而有些人会感到不解，但是高老师认为人类学是非常实在的学科，其追求的是对整个人类的高大上的关怀，但它是从实地调查中生发出来的扎实的学问。而今天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怎样将社区蹲点的民族志转成更好的社会科学的学术产出。

早期人类学发生的时候并不是自己去做实地调查，而都是以特定人的实地调查为材料，进行想象；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创实地调查的方法开始到现在大约 100 年的时间。人类学的这两个环节，就是把老实人的田野作业跟聪明人的人类学一肩挑了，实现了这两个环节的结合，人类学才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科学里面的规范学科。老实人的田野作业方面，人类学研究者秉持一种小学生的心态到异国他乡做研究，像小孩牙牙学语一样学习别人的语言，比如要一笔一划地学习象形文字；从最基本的 ABC 学习罗马体系语言等。人类学研究者需要扎根在一个小的社区，一直观察小人物，过着小日子，实际上是熬着小日子。他们往往需要在比自己正常的学术情况、生活条件差的环境中起码生活一年，这期间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社交圈、离



开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就是人类学者常说的“熬一年”。所以做人类学家的初期考验就会难住很多人，他们熬不过田野作业的难度，因此很多人不会选择这条道路，但是这只是人类学的一个阶段；人类学还是一门聪明人的学问，要求相关学者从这些社区的普通人的生活中看到某些现象，从这些材料中进行学术生产，这个过程是需要智慧、需要想象力、需要阅历的。

高老师认为人类学相关研究人员需要将实地调查得到的经验观察转化为学术主题，需要通过小地方言说大议题，通过边缘研究中心，通过琐碎的日常经验呈现出整体性的文化跟文明，通过他者绕回来认识自我，并通过他者与自我的关联生产新的对“我们”的认知。这个过程需要智慧，需要人类学特有的思想方法。这就是格尔茨的经典表述所表达人类学的两个层次：研究的所在地并不是研究的目的，人类学不研究村庄，而只是在村庄里做研究。认清人类学研究的这两个层次有助于我们加强人类学与其他科学的合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培养人才并形成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

接着，高老师向大家介绍了“世界社会”的基本内涵以及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是其基本指标，即在物理空间由主权国家分占的条件下，产生了一个“社会”世界，具体包括个人与社会组织跨出国家，成为大众现象；国家向外不只是“国—际”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共同想象成为日常经验。

首先，个人跟社会组织走出国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一个偶然现象，但是在二战后这一现象变得普遍，在中国体系里面这一现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经历是一个大众的经历。为什么不使用“世界主义”“全球化”等概念，而使用“世界社会”的概念，就在于这个过程体现出人跟人的联系互动，这是一个经验性的，大众性的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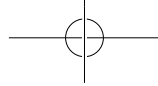
程，因而这个概念才会有特别的意义。其次，一个国家的外部联系不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的空间。因为物理空间下，一国家的领土、主权、所有权的区分很清楚，但是社会空间却是可以共享的和可以相互叠加的。最后，对于世界的共同想象成为日常经验。最基本的体现就是电话的使用，之前不同地域之间难以实现有效地、经济便利地联系，但是现在可以随便打电话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这在以前根本难以想象；其次，是电视直播的广泛应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世界上有些地方还没有电视，但这种情况不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经验），人们都能可以同时参与经历同一个事件。“世界社会”的概念体现出经验学科的研究范围较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世界社会”概念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1940年代二战后开始用“世界社会”或“世界性社会”指称用“国际”概念不足以表述的新现象，代表人物有费孝通、Paul G. Steinbicker等。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世界社会”概念的讨论，代表人物有巴里·布赞、George Krücken and Gili S. Drori等。

今天，“世界社会”已经逐渐成为大众常识，并且是国际上体现政治正确的必要做法。比如1969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后展示的是美国国旗，到2018年美国企业家马斯特组织发射SpaceX时，上面标示的是“人类在地球制造”；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播放的音乐是“东方红”，到2003年中国发射“神州5号”宇宙飞船时，宇航员杨利伟在太空展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联合国旗。在人们日益感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时代，“世界社会”成为人们站在人类制高点表达政治正确时要用的一个概念。

高老师认为西方作为世界社会兴起的推动者，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也是最早的，相比之下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才有机会从中国角度理解世界社会。目前北大人类学专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学界到海外做的民族志项目超过60个，北大师生占30多项；涉足的国家在30个左右，北大有18个；涉及的工作语言20多种，北大有15种。将每一个单独的海外民族志项目联系起来可以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分布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如何形成派生性的、增生性的学术成果，是北大人类学师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目前已经形成多种系列的讨论，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是“一带一路”沿线系列和美国系列。

就“一带一路”系列而言，高老师认为并不是先实际上存在一个“一带一路”的客观事物，后才有“一带一路”相关学术；而是当相关从业人员在做相关的学术，并达到一定的水平、取得一定的成果的时候，“一带一路”才在那儿。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将会引领和重塑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踏踏实实的境外社会深入调查，一个国家很难有一个当代水平的社会科学。

就美国系列而言，高老师接续介绍道，目前北大人类学专业在美国做的民族志点有20个，其中中镇分布有8个。在美国的民族志点都是成规模有分量的，地域上覆盖美国的西海岸、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南部等地区，主题涵盖发展、政治、殖民扩张、宗教、人种等多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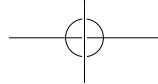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最后，高老师总结道：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说是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过程，民族志点是各个散点，议题是串联它们的线，而形成某一区域则是形成了面。目前的工作是如何将“面”这个层面上的工作做得更好，如何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上更好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人类学的散点调查和对人类整体文明的关怀是人类学的两个基本环节，一个有着提供基本海外民族志经验的“垫底”作用，一个有着作为先头部队能够走出去的“戴帽”的作用。想让这两个环节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区域国别研究

院这样的平台为人类学等学科提供学术资源，包括学生、人才、培养学生的指标和调查经费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跃生老师为大家带来题为“区域与国别经济研究的一点体会与浅见”的演讲。在演讲中王老师回顾了北大区域国别经济研究的优良传统，分析了传统衰落和再度复兴的原因，并就区域国别经济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多方面思考。

王老师介绍道：北大的区域国别经济研究上有着优良的传统，王老师本人1979年进入北大经济系就读的专业为世界经济专业，即研究区域国别经济，包括美国经济、苏联经济、日本经济、欧洲经济、南亚经济等。1958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世界经济专业，研究外国的经济，1959年北大开始招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世界经济跟世界史、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专业，是社会科学的所谓四个“外字号”，历史悠久。但是无论从北大还是从全国来讲，该学科的发展并不好，王老师认为这跟现实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当时区域国别经济的研究与现实相疏离，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是中国还是相对封闭，因而区域国别经济研究难以成为经济研究的主流；另外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讲，国别区域经济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因而往往被经济研究领域的同行诟病和轻视。但王老师表示即使该学科的发展遭遇波折，但是相关从业人员在80年代的研究仍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当时对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经济体制的研究，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有着重要影响。

王老师继续说道，反过来说现在我们重新提出要重视国别区域经济研究也是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从经济角度



来讲，在真正融入全球化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跟国际互相依存，联系日益紧密，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中国不了解外国、不了解世界那将寸步难行。近期出现的中美的贸易战，也启发着我们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决策方式和文化，因为只有深度了解美国的各方面情况才能够对美国未来政策走向做出准确判断。此外在理论、方法论方面，王老师表示他同意上半场汪晖老师的观点，即未来我们将不是用既有的社会科学方法指导区域国别研究和全球化进程，而是用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和全球化的成果重新构建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和体系。当前的经济学就是美国经济学，而未来的经济学可能会有中国经验的总结，可能会有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这些经验做法将成为构造未来全球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着王老师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第一，王老师对当前国内经济学领域存在的研究不扎实的问题提出了批评。王老师认为当前经济学的很多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缺乏逻辑思维、问题意识和理论模型。很多学生的研究工作流于表面，即寻找数据、做回归进而做检验，缺乏深层次的思考。

第二，目前经济学界存在用西方经济学范式分析一切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误区。比如用中国的数据，按照美国的观念和模式做回归，最后出来一个结论，如果该结论跟以美国数据为基础的结论不一致的话就认为这是是中国方面存在问题，还需要改革。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是十分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不管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西方的范式只能是隔靴搔痒，缺乏实际作用。

第三，王老师强调应该重新重视政治经济学，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跟技术方法是同样重要的，是在研究区域与国别经济研究中不可缺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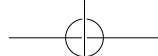
第四，王老师表达了对于区域国别教学和研究日益边缘化的担忧。王老师表示随着市场需要，经济学院研究区域国别经济的老师数量不断减少，仅有的几位老师也马上就要退休了，人才的缺失将成为制约区域国别经济研究的重要原因。

第五，王老师反对经济研究和政治、历史、文化研究的疏离。区域国别经济研究这如果想有所发展，就需要在既有主流经济学训练的基础上加强对学生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训练，现在这方面的训练是缺失的甚至是严重不足的。只有尽可能地培养通晓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同时又掌握经济学方法的通才，才能真正做出货真价实的研究成果。

第六，王老师倡议建立包容多种语言存在发展的体制。目前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英语之外的语言没有存在的环境，这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将是很大的障碍。

最后，王老师认为应该构建适当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区域国别研究当中。区域国别研究有着投入期长、收益小、收益慢的特点，尤其区域国别经济研究在经济系难以成为主流，它需要特别的扶持和养护才能够存在和发展。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教授、北京大学非洲中心理事、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付志明老师给我们带来题为“培养能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的人材，发掘可沟通历史与未来的桥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区域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付老师首先介绍了区域国别研究兴起的必然性和北大从事该方面研究的优势，接着介绍了外语学院多年来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做的努力。最后付老



师就如何更好地建设区域国别研究这一学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付老师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如今兴盛起来，主要是因为国家政治的需要，最直接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在此之前中国经济相对封闭，对周边国家了解匮乏，而现在在中国主动出击走出去的时候缺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因此需要智库，需要去做国别研究。付老师认为北京大学有充分的条件来做区域国别研究，相比于很多院校一窝蜂地建立区域国别研究院来研究热点问题，北京大学的研究将更加纯粹；相比于很多院校缺乏专业或外语基础，北京大学在专业 and 外语基础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接着付老师介绍道，外国语学院对于区域研究有着极大的热情，外语对于外语从业者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是生命，是专业，并且引发外语从业人员对语言对象国的关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外语学院可以大有作为，当前北大在做老挝经济的并不是经济学院，是外语学院；做中东宗教、伊斯兰教的不是哲学系的，是外语学院，这体现出外语从业人员的责任感和热情，正是在这样的感情的驱使下外语学院积极争取建立区域和国别研究二级学科。

但是付老师表示北大的学科壁垒非常严格，外语学院想与其他社会科学院系合作的愿望难以实现。唯一成功的例子是在 2012 年和历史学系联合创办外国语和外国历史专业，该专业的创立有着革命性、跨越性的意义，并且在今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一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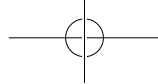
接着付老师就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相关从业人员不仅要懂外语而且要达到熟悉外语的水平，力求外语水平能够达到母语水平。其次，要有专业，比如想要研究缅甸经济，那么其专业就是经济学，要有经济学的理论来做指导，同时又有外语功底，利用外

语来了解被研究地区的人、文化、血缘、人类、民族、宗教、社会等知识。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手资料。相关从业者需要真正到被研究国进行实地考察，而不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误导读者。付老师批评道，目前我们的社会上有非常多半路出家的专家，他们谈及中东言必称恐怖、爆炸和极端主义，但是真正到实地考察人们就会发现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对此付老师提出的建议是培养相关专业学生的“童子功”，措施就是建立“四导师”制度，即首先要有一个语言导师，这个语言导师将衡量把握学生的语言水平和语言理解能力；第二个要有一个专业导师，对未来研究方向相关内容进行指导；第三要有一个国际先进国家的同专业导师；第四要有一个语言对象国的语言导师，这样才能够实现语言研究的落地生根。只有在四个导师形成一个导师组的情况下，区域和国别研究才能够真正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说到招收区域国别研究专业的学生，付老师认为应该招收那些有志向，愿意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愿意为这个专业付出和献身的同学，只要真心热爱，就会不怕付出，不怕辛苦。所以付老师不同意之前高丙中老师提到的从事相关研究是痛苦地在海外熬一年，而应该是非常幸福地在被研究地区生活一年，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中去。付老师以身为例，说道如果他要去俄罗斯，那么难免会感到害怕，因为不懂俄语，担心在俄罗斯会上当受骗；但是如果要去阿拉伯国家，付老师表示他将会非常舒心，因为他懂得当地的语言，可以跟当地人交流谈心，打成一片。

接着付老师介绍了他对于聘用老师的意见。付老师认为一定要聘用志同道合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带活整个区域国别研究。最后，王老师说做好区域国别研究离不开老师们的艰苦付出，有付出就需要有回报，学校和区域国别研究院应该考虑好报酬待遇的问题。如果是双聘的话就应



该有双待遇，只有待遇跟上了，从业者才能有干劲，这个学科才能够实现长远发展。付老师最后表达了希望培养出能够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人才，发觉可沟通历史和未来的桥梁的美好愿景，希望区域国别研究能够得到学校的支持。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宣部思想政治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关凯老师为大家带来题为“全球化、区域研究与人类学：以民族志为中心”的演讲。关凯老师首先简单介绍了成立于2011年的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人类学中心，并表示由于原本准备的题目也是跟民族志有关，讨论话题与之前的高丙中老师的演讲较为一致，因此不再赘言，而主要是对之前几个老师的发言进行回应并提出自己的几点思考。

关老师首先表示自己是学习西班牙语出身，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学西外语主要就是就是研读外国文学，天天在诗歌、原著里面下功夫，而对比现在外语学院的同学受到的外国文史训练相对薄弱的现象，关老师认为一个学科的设计和出现，包括各种资源的流动方向，都是有其社会决定元素的，是结构性的，而不是能动的，这个结构性的社会决定因素就是中国要走出去。所以说没有一个现象的发生是孤立的。

接着关老师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研究泰国中产阶级的老师创造了一个叫作“灵性政治”的术语，这位老师发现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泰国的中产阶级需要从宗教中找资源来解决心理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一种现象，即很多泰国中产阶级一边拥有非常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另外一边又笃信宗教，所以就会有中产阶级的修行并且形成新的宗教形式。另一个例子是现在藏传佛教的金主全是汉人，包括尼泊尔的寺庙都是汉地施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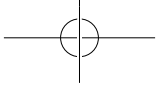
捐赠的钱，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一行为影响到了中尼关系，因为尼泊尔的藏传佛教是尊崇达赖的，来自中国的资金实际上支持了达赖成为藏传佛教的共主，这就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任何一个地方事件都有世界性意义，没有孤立的现象。

接着关老师强调了以民族志为中心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因为通过田野考察人类学从业人员可以真正了解中产阶级的宗教活动、了解巴以冲突中日常生活的细节，这些知识甚至可以颠覆巴以冲突的神话，这些发现是主流知识界无法提供的。人类学研究真实的共同体，而不是想象的共同体。因此区域研究对于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普遍的宏大理论以外的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细节。

关老师讲到大国都是神话的生产中心，政治神话的谣言遮蔽了事件的本质。比如，独立是现在大国吹捧的政治神话之一，但是有众多的研究都发现一个国家实现了独立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了一个大麻烦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是500还是30年？这个过程就类似中国人疑惑续家谱应该从哪续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国家没有独立政权的历史，它的历史跟拥有完善体制的东亚王朝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今天民族志是我们解决很多理论问题的重要方法。

最后关老师表示今天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彻底地更新知识，这种彻底更新并不是进口更多的工具，翻译各种外文术语，出成书，让学生读，开读书会。而是今天的世界是真正正在经历一次新时代，这不仅仅是中国新时代的话，更是一个世界性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因为全球化而呈现两面性，一方面是人类是会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地图空间依然是民族国家主权占主导，但是民族国家已经管理不了时间了，时间在重组，各种历史资源可以被重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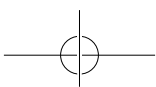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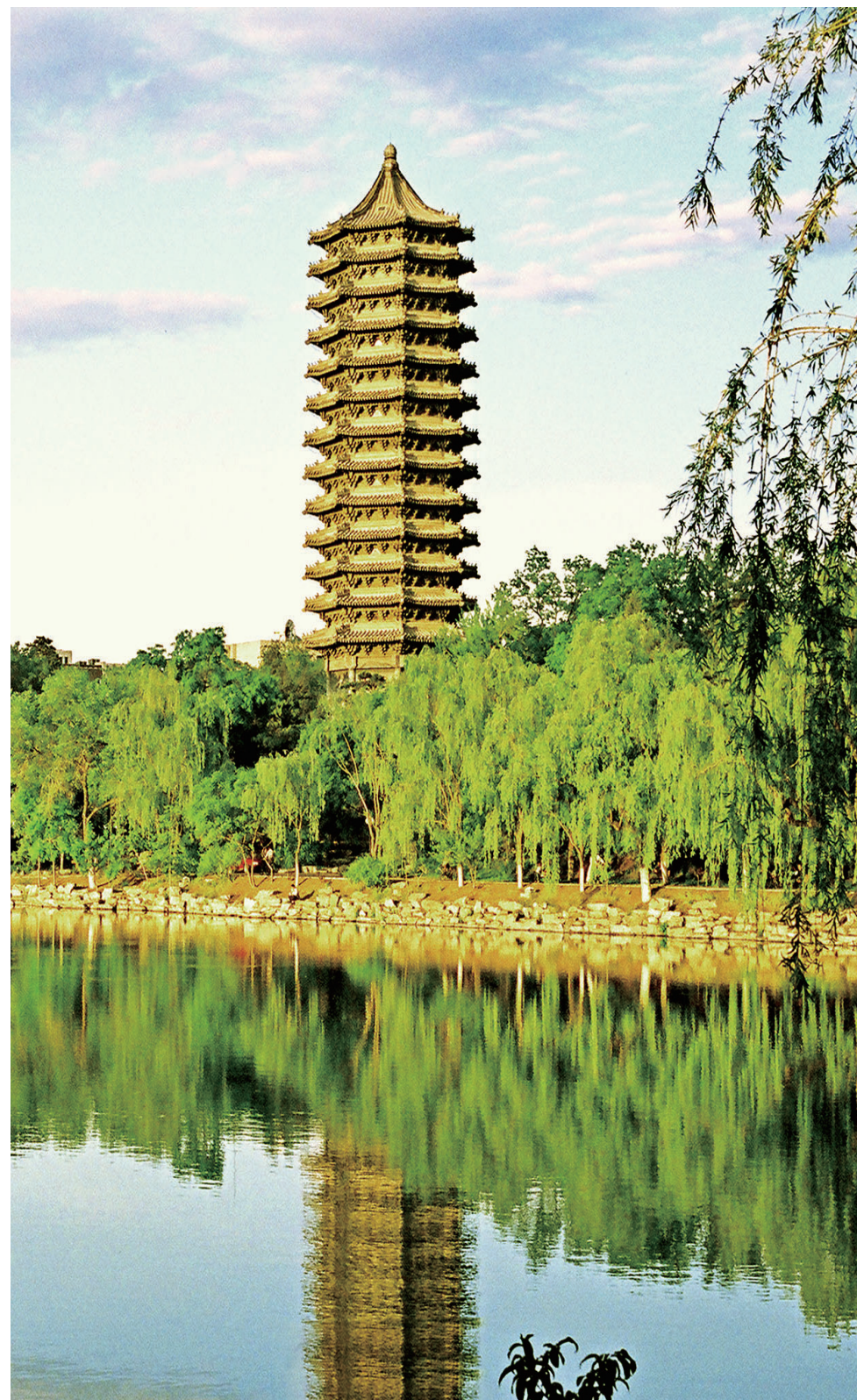
调用，而且是异地调用，讲中国历史故事的是美国人，他们抱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在讲中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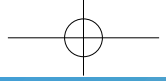
因此关老师表示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更需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也要了解世界怎么看自己，而这些问题都能够从区域研究中找到答案。

【观众提问】：

外国语学院：如何平衡贴近对象国的日常、与他们进行共情和将对象国物化、将对其的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之间的张力？

回答：中央民族大学龚浩群：我们在研究当地人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把他看成一个乡村，任何一个村落的生活也是在国家治理框架之下，甚至可能受到了全球的商品流动或者是资金的流动各方面的影响。比如说现在我的学生去泰国做水果方面的考察，因为现在中国从泰国进口非常多的热带水果，像龙眼、榴莲，这种贸易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们整个种植技术的变迁是怎样的？他们地方政治和国家的预算分配对地方的倾斜的关系神怎样的？所有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怎么样塑造了他们的乡村？我们并没有说把草根看得跟国家、跟全球化对立的层面上看，我们是想看这些东西怎么变成现实。





记录：刘萍

整理：张婷鸽、滕菲

审稿：咎涛

